

## 酒店大厅

### Jiudian Dating

文\_西格菲尔德·克拉科尔(Siegfried Kracauer) 译\_朱晋斌

下界的决定性特征是缺乏张力，因此在酒店大厅内和睦相处就毫无意义。不过，在酒店大厅里，人们确实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这种分离并不使身处其中的人们以教会会众的形式存在；反之，只要不以大厅中的人们作为参照点，酒店大厅便是将人们从日常生活忙乱的虚无中带到直面空虚的地方。

教堂假设在一个社区中，人们彼此成功地建立起联系，一旦社会成员放弃这种社区赖以生存的关系，教堂就只具有装饰意义。即使教堂被逐渐遗忘，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中依然保存着一些特许的场合，使人们想起它，就像它本身可以证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是存在的那样。但社会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社会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看问题，只有将复杂的社会投射于艺术作品上，才能看到两者间的这种类比。酒店大厅反复出现在侦探小说中，其典型特征是——可以被看作教堂的倒置形象。酒店大厅是暗藏着的教堂，只要人们注意到存在于这两个场所中的共同情形，就会意识到前者是底片，后者是前者冲洗出的影像。

在这两个地方，人们都以“客人”的身份出现：教堂为人们敬奉上帝提供了场所，人们去教堂是为了与上帝相遇；去酒店的人们虽不是为了与什么人相遇，他们既不寻找什么人，也不存在找到什么人的问题。但是酒店大厅为他们提供了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地，他们自然是酒店的客人。酒店经理所代表的非人格化的虚无与人们并不相识，与其名义在教堂相聚的上帝类似。教堂中的会众祈求上帝保佑，并履行宗教仪式，以此与上帝建立关系，酒店大厅中的人们则接受了酒店经理的隐姓埋名，不持任何疑义。使毫不相干的人们进入教堂的动机与促使在现实社



会中奋斗的人们走出酒店大厅奔向目的地的动机是相同的。

聚集在教堂中的会众向上帝祈祷并表达崇敬之意，在这种场合中，人们超越了日常公共生活，显得更完美，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消除日常生活的种种瑕疵，而是将它们记住，并不时地重现于人际关系的张力中。对于有共同精神生活的人们来说，教堂中的聚会既是被宗教活动聚拢在一起，又体现出团结一致，这种聚会属于两种领域：法律领域及超越法律的领域。在教堂——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教堂，这两个领域交融在一起，人们启用法律，但并不追究其中的漏洞，把法律中的割裂和不连贯看作是合理的。通过圣会的教化，社区总是不断修复提高自身，从而防止人们的日常生活堕入下流。不过，社区通过修复与提高，回到起始状态，要受时空的限制。特殊的宗教仪式使社区得以超脱世俗，正反映出人处于上下两界之间的尴尬位置，在这种处境的压力下，人们不断地确认哪些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哪些是通过征服得到的。

下界的决定性特征是缺乏张力，因此在酒店大厅内和睦相处就毫无意义。不过，在酒店大厅里，人们确实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这种分离并不使身处其中的人们以教会会众的形式存在；反之，只要不以大厅中的人们作为参照点，酒店大厅便是将人们从日常生活忙乱的虚无中带到直面空虚的地方。人们在大厅中发现自己vis-à-vis de rien（法文，意即“虚无地面对面”），大厅只不过是中间地带，甚至起不到比率所要求的用途（像公司会议室那样），该用途至少可以掩饰小说中已被觉察的指令。虽说在酒店的逗留既不能提供审视日常生活的新视角，也不能使人们远离日常生活，但的确使人们与日常生活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审美角度加以利用——艺术人物是虚构的，非真实存在的，但是审美不费吹灰之力便足以使其凸显于侦探小说中。懒散地闲坐在大厅里的人们，满足而又冷漠地凝视着世界，人们能感觉到自我创立的世界的意图，但是无法将其明确地表达出来。在这里，康德对美的定义被阐释为：“美远离审美标准，而且缺乏实质内容。”在侦探小说人物身上——小说人物被合情合理地塑造得很复杂，可以说成是超凡的主体——审美功能的确与个体的生存相分离了，两者间仅仅是虚构的纯形式的联系，这种联

系反映出人们对世界对自身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对于小说中那些在最后关头全力以赴便可以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的超凡人物，康德有能力抱宽容之心，因为他依然相信超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可以不为人们觉察地转化。他对“崇高”的定义进一步证实他在艺术创作中会考虑到真实个体的生存，在“崇高”的定义中，他考虑到伦理道德，并试图重组碎裂的现实世界的碎片。诚然，在酒店大厅，由于缺乏高尚的因素，审美并未表现出向上奋争的含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公式也穷尽了审美的内容。大厅并不指超脱自身空间之外的其他地方，同样与之相应的审美条件也有自己的限制，只要促成突破限制的张力（紧张关系）被抑制，只要小说中的牵线木偶（虚构人物）将自己隔离于繁忙的事务之外，就不允许超越这种限制。但是，如果审美终结，审美的限制也将消失，审美限制遮蔽了它应当提到的更高层次，而仅仅表现出自身的虚无，这就是康德的定义的字面意义所说的纯功能联系。只有服务于某事物，即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嵌入某种张力中，且不为这种紧张关系所特别关注，审美才能跳出无意义的形式联系。如果人类不仅仅以形式作为目标，就会产生一种令人满意的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是结果而不是目的——以美为目的，但不产生任何结果，美就只是空壳。酒店大厅和教堂都可以满足人们某种合法的需求，因而，其中的审美是有意义的，存在于教堂之中的美使用的语言是双刃剑，既张扬又削弱这种美，酒店大厅中的美则于无声中呈现出错综复杂、无法削减的迹象。寻求绝对理性的文明终结于大

厅中典雅的扶手椅上。而教堂长椅的装饰图案却产生特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与之相应的装饰带有启示性的意义。结果，宗教仪式上的赞美诗变成了集成曲，曲调使人们将琐碎与忠诚凝固成爱欲，毫无目的地漫游。

信徒的平等关系以一种变形的方式表现在酒店大厅人们的关系中。在圣会中，人与人的差别消失了，因为所有的信徒都拥有同样的归宿，祈祷便是与主宰人类命运的圣灵相遇，任何与圣灵无关的事务——人类所设想的必然性的界线以及自然形成的分离，统统不复存在。在教堂里，会众生活便暂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于是有罪者与正直的人一样进入“我们”的行列，今后者感到烦恼不安。会众的平等正是基于每个人都将面对日后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人皆有一死）这一点。伟大人物与渺小人物并排而站，因为没有衡量的尺度，善与恶混杂于人群中，无法截然分开。人们并不因为这种状况而困惑，相反，这种状况使人们处于现实的层面，因为决定最终的结局是：过程中的事情虽受到震动，但要保存完好。这种平等关系是积极的，而且很重要，不是降级也不是仅仅起装饰作用，而是为了保持已经存在的区别，为宗教仪式期待、寻找最终的与众不同，人的生命有极限，人一旦接近极限，极限的阴影就会划分出那些区别。

在酒店大厅里，平等不是基于人们与上帝的关系，而是基于人们与虚无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毫无联系，环境变化不会引发针对性的行为，而是搁置这种行为，以维护所谓的自由，环境变化最终消失在人们的休闲和冷漠中。在教堂，生命只是

短暂的旅途这一点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也使权威明确的事情不那么确定。与之形成对比，在酒店大厅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纯粹的游戏消遣，使随意的日常生活上升到严肃庄重的层面。西美尔给社会下的定义是“社交的游戏形式”，这个定义合乎逻辑，但仍只是描述性的定义。酒店大厅中呈现的是众多形象形式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体现了撤离而不是执行，没有熙熙攘攘，也就远离了世俗生活，但是并没有作出新的决断，也没有确定这些决断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助地降级成“社会的一员”，站在边缘，显得可有可无；当加入“游戏”中时，就变得兴奋激动。虚幻的毫无价值的归属感不是将人引向现实，而是使人滑入更加虚幻，由雷同的原子组成的混合状态，这种混合状态构成了世界的景象。在教堂里，每个个体都以社区支持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在酒店大厅中出现的个体，只是充满理智的集体中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一份子。个体靠近虚无，通过与抽象正式的普遍概念类比体现自身。以普遍概念为基点的思考实际上脱离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却深信能够把握世界。抽象概念是从现实人际关系中孕育而生的普遍概念的倒置镜像，如果说不可掌握的假设之物尚有些内容的话，抽象概念则抽空了其中的内容，不是将其引向现实的层面，而是将其与更高层次的决断相联。这些抽象概念与掌控世界、完全的人无关，相反是由超验主体提出的。超验主体允许抽象概念失去效力，在这些概念中，超越的主体堕落成其所宣称的造物主。尽管自由流动的比率——模糊地知道自身的局限——

承认上帝、自由、永生等概念，它所揭示的却不是同名的存在主义的概念，而且绝对命令不可替代道德律令。不过，将这些概念编织成一个体系，证实了人们不愿放弃已失去的现实。当然，人们也不可能确切地抓住现实，因为他们探索现实的方式是思考与现实毫无关联的事物。当比率摘掉面具，冲进任选的抽象概念的虚无之中，并且这些抽象概念不再戏仿更高意志时，当比率放弃那诱人的协调，并使自身成为一个概念时，人们就会抛弃比率。比率最一目了然的性质就是公开承认的虚无，并极力在虚无中使现实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实际上，比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根本就无法触及现实。由于人处于人际关系的张力中，所以上帝或自我陶醉的智者成了世界的创造者和终结者，是上帝或智者于虚无中创造了众生。比率自信能够将世界从毫无意义的苦难中拉出来，世界处于空无的边缘。两者的距离很小，仅够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当世界被经历过的普遍性所阐释时，世界才成其为世界。智者将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成能量的一般性指标，这与空无之间仅隔着一层薄纱；或是取消历史似是而非、矛盾的本质，把历史看成是在一维空间中进行；或是虚伪地暴露自己，将荒谬的“生活”上升成高贵的存在状态，从目前解放了的人类总体的残余中再现自身，以求自我膨胀，跨越自身的领域。如果一个人将这些毫不真实的东西当作基本原则，那么（正如西美尔的生活哲学所表明的那样）他得到的就是对上界的歪曲的形象。该形象与“上帝”、“灵魂”这些词同样费解，即使不像这些词被滥用、模棱两可、不可理

解，是空洞的抽象概念的展开，而抽象概念来源于脱离人际关系张力的思考。酒店大厅的客人们允许个体戴上完全相同的社会面具，从而消失在面具后面，这正符合一贯的做法：从空无的统一之中剔除不同之物。酒店大厅中，客人们通过穿无尾礼服，暂时搁置不确定的特殊人物；在教堂则不会这样，因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酒店大厅中的人们谈论随手拈来、人人都能参与的话题，将注意力随意地集中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他们每日言谈的都是琐碎的事情。

酒店大厅和教堂一样。要求安静，这表明身处两个地方的人们认为彼此是平等的。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中作了如下系统的阐述：“寂静中散发的庄严支配着整个屋子。这是所有大酒店都引以为豪的庄严，小心谨慎的服务员走动时不发出声响，偶尔能听到倒茶声和一两句耳语声。”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寂静会产生庄严，但是这种庄严却毫无实质内容，既不源于人们彼此尊重，也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那样，这种庄严是为了消除差异。从具有区别功能的词中抽取出的安静，使人们进入一种所谓的平等状态，这是遭遇空无时的平等，是一句说话声就能打破的平等。相反在教堂，安静表明人们集中注意力，审视自我，彼此间不再说话，是为了等待另一种话语出现，这种话语不论说出与否，都审判着人们的言行。

既然人们彼此的交谈无关紧要，教堂会众的名字也就逐渐消失了。姓名起标识个体的作用；祈祷时，具有不同经验的个体消失了，彼此间的差别，不同的生存状态消失了，当然也就用不上名字了。名

字能揭示拥有该名字的个体，也能把他与其他人分开，名字同时具有揭示和遮蔽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恋人想取消名字，把名字看作他们之间最后的隔阂。放弃名字意味着打破人们之间的隔阂，使人们超出交往中的一纸之隔，获得广泛的团结，进入更神秘的境地。既然不知道谁最接近自己，人们便认为邻居与自己最亲近，因为邻居与自己尽管相貌不同，却有同样的特征。的确，只有站在上帝面前，脱离了日常生活相对的形式使人进入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状态，人们也探究着这种状态，得以进入以教友相称的神秘境地，向上帝祈祷时，彼此变成了透明体，于是人们使用“我们”一词，以求同存异，彰显共性。

失去了自身特性的人们，聚在一起，用“我们”相称。在教堂，由于人类的局限，人们通过他人的感受意识到“我们”。“我们”在酒店大厅中转化成孤立的，不知名的个体。这里，某人与他的职业分离，名字则消失殆尽，这是因为只有未命名的人群可以作为起点，服务于比率。比率降到空无的境地，试图从空无中创造出世界，甚至降至被剥夺了个性的所谓的个体的地步，这些个体没有名字，除了沿着常规之路穿行，别无他用。但是，如果放弃名字仅仅为了表示开端的毫无意义，为了描述表面的规律性，那就不可能孕育因放弃名字而产生的团结一致，反而



剥夺了交往中名字带给人们的联系。残存的个体进入休闲天堂，脸庞消失在报纸后面。大厅中的灯光照亮的只是一个个体模型，陌生的人们进进出出，因为丢失了口令而变成空洞的形式，行走时就像无法抓住的、毫无生气的鬼魂。如果他们拥有心灵，那也是没有窗户的心灵，他们将意识到自己在无止境地放弃，但不是像教会众那样知道自己的家园而会毁灭。至于外表，他们彼此疏远，还引以为美，用这种方法摆脱自身，表达自身的不存在。他们为表象所吸引，为异国情调的气息而愉悦。他们喜欢疏远，事实上，为了证实疏远，他们尽管神奇地来到同一家酒店，却不肯相互接近，而是彼此拉开距离——他们没完没了地幻想给面具赋予名称，把对面的人当作微不足道的玩物。承认彼此间快速的目光交汇使他们能够交流，只是为了证实目光短暂的交流是假象，彼此间的疏远是现实。像在教堂中一样，在酒店大厅里，不提名字揭示了称呼名字的意义，但不同的是，在教堂，这是一种在人际关系张力中的等待，揭示着名字的起源，在酒店大厅，则是退回到公认的虚幻，认为智者命名了一切。只要听不到人们以“我们”相称，人与人之间就仍然是孤立的。

在教堂圣会上，形成了新的社会，由于人们与超越人类法律的神秘力量直接联系，法律处于矛盾的地位，上帝在场时，法律便被搁置了。人与上帝的联系足以使过于自信的人谦卑，使处于危难中的人得到慰藉，法律成了倒数第二位。在酒店大厅中，人们毫无人际关系的张力可言，也体现着一个新的社会，这不是因为卓越使人们超越自身的水平，相反是因为无所不在的繁忙的上帝还没有显现出来。神秘力量不是引导人们超越自身，而是驻足于面具之间；不是除去人们虚伪的外壳，而是像面纱般遮住所有人类的事物；不是使人直面生命短暂的问题，而是使人停止思考人生的短暂性。斯温·艾尔维斯达德（Sven Elvestad）在充满思考的侦探小说《死亡潜入酒店》（Der Tod kehrt im Hotel ein）中写道：“又一次证实，大酒

店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与酒店之外的大千世界相似。客人们轻松地漫步，欣赏夏日的美景，丝毫没有觉察奇怪的神秘之物已聚集其中。”“奇怪的神秘之物”这个短语的意思含糊，内含反讽。一方面，可以在通常意义上指有些生物能伪装掩饰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也指更高级的神秘之物，通过变形，在世上做出危害人类生命的非法行为。这个短语最早是指所有合法和非法行为的隐秘的特征，同时也暗示酒店生活是在无所不在的上帝面前展开的，但正被推回源头。如果人们能看到神秘之物的真相，将非法的行为与空无分开，就会使重要的事情显现，仅存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在事实面前消失。所以，酒店的管理小心翼翼地对客人们掩饰真相，这些真相足以揭开笼罩在虚无之上的、产生虚幻美感的面罩。以往所经历过的是更高级的神秘之物将那些对之感兴趣的人通过中间点拉入其中，法律明确了其中的限制，与之相似，经过变形的神秘之物——这种变形的神秘之物危害人类，扰乱人们的内在生活——将人们带入毫无意义的、被遗弃的、虚假的中立地带。在服务于自由的比率时，这种神秘使差异无法产生，并通过彰显常规惯例，使事实无法在大厅中浮现出来，以此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常规惯例如此陈腐，以至于以其名义发生的事情同时起到掩饰作用——既保护合法的生活，也保护非法的生活，这是因为陈腐的常规只是社会的空壳，不为任何具体的事务服务，只满足于自身的空洞和毫无意义。■